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初的偏向与纠偏(1953–1954)

——以中南区为中心

常明明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余粮以支持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从该政策在中南区实施之初的情况来看,由于部分干部执行政策发生偏差,任务观点重,在一些地方忽视对农民的思想发动,把复杂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简单化,把它看成单纯的“向农民要粮食”,从而发生了统购面过宽,对富裕农民打击过重等偏向,引起农民思想混乱,造成农村形势紧张。针对政策运行中存在的偏向,中南区各级人民政府随即进行了纠偏,通过政策宣传以消除农民的思想顾虑,同时建立农村初级粮食市场解决农民的余缺调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经济的死滞状态有所好转。

【关键词】粮食统购统销;偏向;纠偏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1-0076-12

Deviation and Correction of State Monopoly of Purchase and Marke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Implementation(1953–1954)

——With the Central-South Administrative Area as the Focal Point

CHANG Ming-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Abstracts: The state monopoly of purchase and marketing policy w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the state to buy surplus grain from farmers at low prices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in the Central-South administrative area, as the cadres were unable to grasp the policy clearly and had a heavy view of their tasks, they ignored the idea of launching the peasants in some places, and simplified the complex policy of unified purchase and marketing of grain. It was regarded as a simple "asking for grain from peasants", which resulted in a wide range of purchases, a tendency to crack down on the heavy weight of the rich peasants, caused confusion in the peasants' thinking, and resulted in a tense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According to the bias existing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policy,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the Central-South administrative area immediately rectified the deviation, used policy propaganda to eliminate the peasants undefined ideological concerns,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ed a rural primary grain market to solve the peasants undefined remaining and lacking adjustments. Thu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tagnant state of the rural economy improved.

Keywords: state monopoly of purchase and marketing; deviation ; correction

[收稿日期] 2018-0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950–1956年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7ZDA03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民经济行为研究(1949–1984)”(16BJL015)

[作者简介] 常明明(1974–),男,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

粮食统购统销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之一,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成果不断涌现^①。但现有成果,一是,对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背景及1955年实行“三定”之后的运行情况研究较多,对政策实施之初的问题与矛盾探讨还较为欠缺;二是,多囿于政策层面的梳理,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主体和客体——农民的反响与行为研究还显得不足;三是,主要集中在统购方面,而对于统销,尤其是对农村缺粮户的统销却较为忽视。爰此,笔者拟用所掌握的材料,以中南区为中心对1953-1954年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初的偏向与纠偏作一番梳理,以期进一步揭示统购统销政策运行的复杂面相。

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初的偏向

土地改革后,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量增加,但首先用于改善其自身生活,粮食商品率并不高^②。国民经济恢复后,国家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工业化建设快速推进,使得粮食供求紧张形势顿时凸显。为了缓解粮食供求矛盾,1953年10月,国家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余粮。在当时自由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统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在春夏荒月以高利放出或高价卖出是可以盈利数倍的^③,这必然会使他们产生顾虑与不满。

(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初的偏向

1.粮食统购之偏向

1953年的粮食统购工作是在开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础上进行的,总路线在农村的宣传主要是围绕“两条道路”教育、批判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行为而展开的。粮食统购工作一般是首先召开各种组织会议,宣传贯彻政策;然后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层层交任务,区布置到乡,乡布置到村,先干部后群众,进行摸底算账,掌握各户生产收入与支出情况;最后在摸底的基础上,通过群众自报互评,把任务分配到户。也有个别地区采取“以报定售”,根据自报来确定任务。但由于统购工作复杂细致,同时又是一项新的工作,干部无经验,群众不习惯,心中无底,做法粗糙,确定到各户具体任务时,缺乏依据,因而在政策执行上产生了一些偏向,不少地区发生左倾蛮干、命令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分干部执行政策发生偏差,造成农村形势紧张。有些地方忽视对农民的思想发动,把复杂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简单化,把它看成单纯的“向农民要粮食”,因此就错误地采取“加政治压力”“杀鸡给猴看”“不认购不散会”甚至采取“围攻余粮户”等一套生硬办法。如江西临川县韩峰、丰城县爱国、浮梁县蓝田等乡均发生吊打群众及搜仓现象,爱国乡有的干部错误地宣传说:“明天的口粮就是今天的余粮”,并发动缺粮户催余粮户卖粮;群众反映说:“土改斗地主,现在斗贫雇农。”^④在河南,由于总路

①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统购统销政策形成原因及决策过程、统购统销与工业化的关系、统购统销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影响、统购统销对粮食流通体制的影响、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及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统购统销与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统购统销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情况、统购统销与票证制度等方面。参见王丹莉:《统购统销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另可参见田锡全:《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著作中有关学术史的回顾。

② 如据对1954年18个省13245户农家的调查资料,粮食商品率为25.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1954年我国农家收支调查报告》,统计出版社,1957年,第37页。

③ 据研究,1953-1978年,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上涨了50%,同期自由市场粮食价格却上升了近3倍。参见郑风田:《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④ 《江西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山西省档案馆,21-1-8-1-2,第194页。

线宣传不够深入和广泛,在统购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在少数干部违法乱纪,一部分干部表现出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在某些发生违法乱纪和命令主义严重的地方,一部分群众对政策发生错觉,生产积极性受到某些挫折,对党和人民政府抱怨,反革命分子乘机破坏^①。在湖北,开始布置购粮时,只强调了依靠贫农和缺粮户,在购粮工作中如何巩固地团结中农及如何正确地进行对富农的斗争,则交代的不够系统与具体。再加之部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以致在部分地区发生强迫中农和对富农斗争过火的现象^②。在广东,在总路线宣传中,由于没有很好地从正面说清楚新旧两条道路,说清楚购粮政策,而是进行思想批判,检查自发势力,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劳动积极性的界限又说不甚清楚,引起了某些乡村积极分子的思想混乱,情况紧张,而当时购粮工作还未下乡,这些积极分子又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也就造成了农村的一些紧张空气,再加上反革命分子、奸商趁机造谣,农民思想一度发生某些混乱,并在部分地区发生杀鸡杀鸭、宰猪卖牛等不正常现象^③。另外,有些地方在宣传总路线时,提出了许多错误口号,如“宣布私有制六大罪状”“拔光挤净自发势力的根子”“有余粮就是手里不干净”等,引起农民不安^④。

二是,统购任务分配不合理,畸轻畸重。如湖北个别地区,由于统购任务分配过重,以致发生强迫群众出售全部余粮,甚至动了部分口粮的现象,遭致群众极大不满^⑤。河南省统购面虽一般控制在50%-60%(洛阳专区统购面平均为55.6%,其中产粮区为60.34%,山区为57.88%,经济作物区为37.83%;南阳专区统购面平均为50%;新乡专区11个县统购面平均为47%),但由于工作粗糙,在不少乡村约有5%左右的户是因干部动员而售出口粮,引起群众对统购政策的怀疑,人为扩大了春荒,并使一部分积极分子遭受困难^⑥。又如江西赣县吉埠乡调查,1953年该购未购,该多购而少购的占全乡总户数的30%,不该购而购和该少购而多购的占全乡总户数的60%,个别村购粮面达98%^⑦。另据湖北8个乡2467户调查,1954年粮食(原粮)收入共计10812495斤,人均1086斤,消费需要591斤(含口粮504斤,饲料21斤,种子54斤,机动粮12斤);公粮178斤,占人均总收入的16.39%。除去消费需要和公粮负担,人均应有余粮317斤,占总收入的29.19%,共有余粮3146532斤。1954年共统购3311411斤,占总收入的30.63%,超过余粮数5.24%。另据孝感县太子、大陈2个乡调查,各阶层出售余粮情况是:贫农281户,余粮101886斤,卖出177905斤;新中农216户,余粮203469斤,卖出20139斤;中农(不含富裕中农)160户,余粮155177斤,卖出157122斤;富裕中农47户,余粮85021斤,卖出74630斤;富农45户,余粮67492斤,卖出55795斤^⑧。

①《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粮食统购工作的总结报告》(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54年10月,第165页。

②《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总结报告》(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81页。

③《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广东省购粮工作初步总结报告》(1954年元月28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86-187页。

④《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目前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34页。

⑤《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总结报告》(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77页。

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粮食统购工作的总结报告》(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92页。

⑦《江西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194页。

⑧《湖北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110-111页。

产生上述偏向,固然与统购工作是一项新工作,干部群众均缺乏经验,且要求严、限期短,部分干部存在单纯任务观点有关。但从更深层次上来分析,产生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有些同志不了解改造小农经济是个比较长期的教育过程,农民的私有制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没有认识到私有制未基本改变以前,自发势力的“根子”就不可能“拔光”。二是,改造小农经济的道路应该是在农民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来进行的,而不应采取剥夺的办法,有些同志企图以“宣布罪状”“拔光”“挤净”“围攻”等硬性斗争办法对待农民,从而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三是,有些同志不了解粮食政策本身就是限制自发势力发展的政策,这个工作做好,就是在农民自愿基础上把个体经济在一个重要方面纳入国家计划之内,限制自发势力的发展。一些同志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向农民交代清楚粮食政策方面,反而脱离统购粮食的政策,泛泛地去开展反对一般自发势力的斗争,从而发生了机械过火斗争的偏向,造成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由此,不但增加了购粮工作的困难,造成人为的紧张,而且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

2. 粮食统销之偏向

在粮食供应方面,从农村自由市场过渡到有计划的供应是农民交易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工作。在统销工作办得不好,特别是重统购轻统销草率从事的地方,必然会影响农民在生产生活上所需粮食的供应,进而影响其生产情绪与地方秩序的安定。从调查资料来看,不少地区由于对粮食统销重视不够,工作做得极为粗糙,没有深入进行摸底和认真发动群众,以致产生统销的面很宽、量很大,一些真正缺粮的农民反映没有保证供应的不正常情况;而另有一些地方又卡得过紧,不能保证适当的供应,亦引起群众的不满。

如湖南长沙县草塘乡调查,全乡 1953 年粮食收入(包括稻谷及小麦、豆类、荞麦、薯类折粮数)共 1 846 727 斤,人均 898 斤。全年消费 1 339 706.5 斤(包括主食 1 164 981 斤,副食 18 657 斤,种子 63749.5 斤,饲料 92 319 斤),占全年粮食收入 72.54%。可提供商品粮 507 020.5 斤,占全年粮食收入 27.46%,其中公粮负担 393 237.5 斤,占全年粮食收入 21.29%,余粮 113 783 斤,占 6.16%。全乡共有余粮户 214 户,占总户数的 50.12%,缺粮户 188 户,占总户数的 44.03%。1953 年全乡统购户共 304 户,占总户数 71.19%,共统购粮食 178 000 斤,占粮食总收入 9.64%,超过实有余粮数 56.44%;统销户共 362 户,占总户数的 84.78%,共统销粮食 228 048 斤,占统购数 128.12%,统购统销面均偏大。因而形成该多统购的购少了,不该购的也购了,该多销的销少了,不该销的也销了。突出的情况是:有不少户本身是统购户,但又是统销户。据统计,类似这种情况的户共有 258 户,占统购户总数的 84.87%,共统购粮食 177 544 斤,统销 154 788 斤。在统购统销后,特别是在 1954 年春夏间,曾出现某些混乱现象,群众普遍叫喊没饭吃,真正缺粮的叫喊,某些不缺粮的也跟着叫喊。坏份子则从中造谣破坏,如说:“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粮食都运到苏联和外国去了”等等。干部方面则对实际情况始终心中无数,既不能分清情况解决问题(该乡统销后有连续补销了 4 次,均未能解决问题),又无法理直气壮地去说服群众,有的干部一见群众叫喊,无话可说,就只好把自己的粮票给群众,工作很被动^①。

(二) 各阶层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的反响

经过总路线的教育与批判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之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农村新旧两条道路的斗争渐趋尖锐化,每个阶层每个农户均会根据其切实利益考虑新旧道路的取舍。但由于个体农民受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对社会主义一时很难完全正确的理解,总路线的精神也难于一次“大张旗鼓”宣传就能做到家喻户晓。因而农民在接受总路线的教育时,虽然表现为热情拥护,但其思想情况又是错

^①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长沙县草塘乡农村调查报告(初稿)》(1954 年 10 月 7 日),湖南省档案馆,146-1-96。

综复杂的。先进群众积极性虽高,但多数带有很大的盲目急躁情绪,表现为热情高,办法少,想走“新道路”,不知怎样走法,迫切要求予以指导;中间群众口头赞成,但从心怀疑虑,向往“过渡”又怕“过渡碰了石头”;觉悟差的群众则误解很大,以为社会主义是“一拉平”,共同上升是“等齐上升”,合作就是“合大锅”,心里害怕,口里不敢讲,在少数农民中还出现了大吃大喝,杀猪杀鸡等破坏生产的现象^①。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工作的粗糙现象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在运动中由于政策宣传的某些片面性及农民认知的限制,也就会在某些地区某些农民中间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如在统购工作中误认为“余粮户不光荣”,在办粮食统销时,本来并不缺粮的农民也要领取购粮证,要“争取当个缺粮户”,个别地方的农民在进行副业生产时,要到政府请示,“怕犯自发势力的错误”,售粮现款有浪费现象等。具体到各阶层来看:

1. 贫农

广大翻身贫雇农是坚决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他们反映:“一想到翻身,生活改善,就想到共产党、毛主席”,对于粮食政策认识是“毛主席点点滴滴都是为我们”,这些人经过总路线的教育,觉悟就会进一步提高,就会成为运动中的骨干。其中有一部分虽余粮不多但实际上已上升为中农,一部分已经有了轻微的剥削行为,但经过总路线的学习,打通了思想,他们反映说:“我本不想走旧道路,不知不觉又走了旧道路,真对不起毛主席”,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是积极拥护的^②。少数对统购中偏差有些意见,但也只说:“我的粮食横竖要卖,卖又没吃亏”^③。这个阶层经过发动,出现了许多积极分子,他们是粮食统购运动的依靠力量。

2. 中农

包括一般中农和富裕中农,他们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一些中农学习总路线反映说:“剥削别人,第一是太丑,过去打倒地主,就是因为他们剥削;第二是害国家害人民;第三是没有出路,国家银行、商店、合作社天天发展,即使当了资本家也没有前途”^④。一般中农对统购政策反映尚好。基于上述情况,在统购中必须坚持对中农巩固团结的方针,要用很大力量教育和发动这一阶层,反复地对他们讲清对中农的政策,这是完成粮食任务的重大关键之一。

约占农村户口总数 20%左右的富裕中农,持有较多余粮,在购粮运动中表现动摇性较大,思想斗争剧烈。但其中有部分较富裕的中农因不能再囤积粮食进行投机和债利剥削,因而有抵触情绪,表示不满,有的干脆囤积不卖,把粮藏在夹墙中或缸瓮中,到处讲怪话。如说:“政府统购硬缺德”,“铜钩(统购)铁钩都勾不出我的粮食去”,“你有多几多粮,政府就有多几大的会(意即通过开各种会议将其粮食购走——引者注)”^⑤。富裕中农对抗统购的办法:一是,装穷叫苦,硬说没得。如麻城四山乡富裕中农杨宗桥,见干部到他家吃饭,就煮野菜吃,而自己却吃的糯米饭,还有肉菜。二是,搞假分家,这样好多留粮。三是,搞假合作社和互助组,集体瞒产,在党领导薄弱的乡村,这种形式比较普遍。四是,拉拢落后农民,孤立与打击贫农积极分子,以便自己不受挤,能过关^⑥。

①《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发展互助合作、提高农业生产的工作决议》(1954年4月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41页。

②《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目前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36页。

③《江西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195页。

④《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目前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36页。

⑤《江西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195页。

⑥《湖北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114页。

3. 富农

他们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他们是要求自由市场的,不愿受国家任何干涉,思想抵触很大。当广大贫雇农特别是中农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很不老实的,往往传播谣言,散布不满意的话,叫苦,拉拢干部,企图隐瞒余粮,对于总路线也很抵触,如有些富农说:“我春天借粮食给他,救了他的命,还说是剥削,真没良心。”^①富农对统购抱着对抗态度,他们一方面装穷叫苦,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逃避卖粮,如把谷磨成糙米等,有的仍想做投机生意,有的则制造紧张空气说:“没粮吃,快饿死了,他们做事缺了德,连口粮也购了”^②。富农对抗统购统销的办法:(1)利用各种办法套购粮食。一是当小挑贩、到外面卖窑货、装穷人,说他没有供应,卖东西要粮食不要钱。二是学手艺,如钻磨子等,工资只要半价,但要粮食。如麻城四山乡地主周三义学习钻磨子,半年即囤积小麦 600 斤。三是组织假互助组,利用副业为名,套购粮食,如四山乡富农周远贵,组织假互助组,套购豌豆 1 800 斤。(2)利用小商贩,套购粮票。如谷城县付湾乡富农黄先洪,利用小贩陈洪钧(贫农),勾结地主陈良珠,套购 1 900 斤粮票(每百斤收购价 0.2 元),卖给南漳及河南缺粮户,获利 40 元。(3)软拖硬抗,不卖粮食。如当阳县黄林乡富农陈本应开始动员卖粮,他怕群众挤他,故意报得很多,结果叫他卖粮他不卖,一问他,他就背着被子往乡政府去坐牢,干部群众对他均无办法,1954 年少卖余粮 900 斤。(4)利用宗族关系,拉拢干部,隐瞒产量少卖余粮。如当阳黄林乡富农陈本智拉拢互助组长陈国清,在他包庇下瞒产 900 斤,后又拖欠卖余粮数 300 斤^③。但富农又有软弱的一面,只要将广大贫农、中农发动起来,他们感到孤立了,态度就会变得老实一些。

(三)粮食统购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由于国家统购粮食和油料,农民已有的副业门路大为减少(如碾米、贩运)或增加经营困难(加制粉熬糖缺原料,养猪养鸭缺饲料),人民政府未能及时具体指导农民寻找新的副业门路和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加之农民划不清正当副业与自发势力的界限,存在很大顾虑,以致农村副业生产一时下降,农民收入减少。统购后农村借贷,由于划不清互济性质与高利贷的界限,也形成死滞现象,增加了部分农民的困难。从当时的调查资料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乡村副业大为减少。据湖北 9 个乡 689 户副业生产情况的调查,1954 年副业生产折合稻谷 627 786 斤,比 1953 年减少 26%。其中贫农、新中农、中农、富农 1954 年副业收入比 1953 年分别减少 27%、21%、44%、33%。副业减少的主要项目,是养猪、食品加工业(榨油、豆腐坊、粉坊、面坊等)、纺织及运输(包括挑贩)等 4 类。根据调查,各项副业 1954 年比 1953 年减少的情况是:猪减少 9.5%,食品加工业减少 45.1%,纺织减少 67.2%,运输减少 18.2%。猪减少主要是因饲料不足,如当阳县胡场乡富裕中农冯有根说:“往年喂猪至少 1 石大麦(合 180 斤),现在顶多 80 斤,怎么能喂猪呢?”另据恩施滴水乡调查,全乡 1954 年因缺饲料,提早杀猪 300 头。纺织及食品加工业(榨油、豆腐坊、粉坊、面坊等)减少,主要是统购后,原料缺乏。在田少人多、劳力有剩余的丘陵地区(如麻城四山乡 1952 年副业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 25%),副业收入减少,大大影响农民生活,群众反映很大^④。

另如湘潭县清溪乡新中农庞敬秋,家里 7 口人,7.46 亩田,土改以来,他副业生产搞得多,主要是喂猪,每年要喂 3-4 栏猪,每栏 5-6 头,并兼做豆腐。1954 年统购后,由于留粮只够自己吃,不能用较

①《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目前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 137 页。

②《江西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 195 页。

③《湖北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 114 页。

④《湖北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 112-113 页。

多的主粮喂猪,只养2头猪,豆腐也没有做了,因此对统购仍表示不满,说:“我只7口人,每人只1亩田,如果不能让我搞点副业,光靠田里,那只有喝西北风(意即不够吃)。”^①

2.农民从事商业活动大为减少。如湖南长沙县草塘乡,统购以前,该乡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从事商业特别是从事粮食交易的较多,据1953年秋前统计,全乡57户新、老富裕中农中,进行投机性质的商业活动的4户,买卖新谷的有16户,占富裕中农总户数的35.05%。如新富裕中农王寿云,1952、1953两年即共倒贩稻谷43000余斤。统购以后,从事商业活动已大为减少,除少数坐商外,一般均系从事肩挑小贩。其具体情况是:全乡从事商业活动的共有18户,占总户数的4.22%。其中坐商3户(2户经营商业,1户半农半商),占从事商业户数的16.66%,商业资金1800元,占资金总额的70.86%;以农业为主,农闲从事肩挑小贩的15户,占从事商业户数的83.33%,商业资金74元,占资金总额的29.14%^②。

另如湖南衡阳县永寿调查,该乡过去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为数较多,1953年秋收前统计,经常经营商业的达56户,占全乡总户数的14.21%,粮食统购统销后已减至8户,其具体情况与原因是:(1)做米生意者9户和做油生意者2户,粮油统购后,已不再经营。(2)做瓷碗生意者9户,在国营贸易加强了产地货源的控制和市场管理后,进货困难,亦不再经营。(3)经营食盐、布疋、肥料等供应品的小贩28户,由于供销合作社的扩展业务,地区差价缩小,利润削减,也均不再经营。粮食统购统销后经营商业的8户中经常经营商业的只3户,半农半商的4户,以农为主的1户,从业人员每户各1人。分阶层看,地主及其他剥削阶层占4户,老富农、富裕中农、中农、其他劳动人民各1户;从经营的商品种类看,8户内有3户系经营肥料种子,5户经营柑橘、茨菇等商品^③。

二、人民政府对统购统销运行的纠偏

粮食统购统销对各级干部和群众均是一个新鲜事物,在运动之初随即暴露出诸多问题和偏向,应该说,在统购统销运行过程中是边实施,边纠偏。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就指出:“统购粮食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而是国家计划经济建设所必需的长期性的措施,所以在努力完成今年统购任务的同时,要保证达到明年粮食增产的目的。只有在粮食年年增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充分保证国家建设所需的商品粮食的供应。因此,望各地党委对已发生偏差的地方,要采取有效措施,使混乱现象停止下来,不能任其滋长,要做到既能胜利地完成购粮任务,又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从而达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前进的目的。”^④从当时的实践来看,纠偏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强宣传教育,消除农民思想顾虑

1954年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布了《关于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某些地方由于在购粮运动中不恰当地批判农村“自发势力”所引起的部分群众的误解,必须结合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总路线的深入教育划清政策界限,把资本主义与个体农民中的自发势力区别开来,把投机商人的投机活动与正当副业加以区别,把一般利息的借贷与高利贷者加以区别,把粮食投机与偶尔倒卖少量

①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湘潭县清溪乡农村调查报告》(1955年4月20日),湖南省档案馆,146-1-175。

②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长沙县草塘乡农村调查报告(初稿)》(1954年10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146-1-96。

③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衡阳县永寿乡农村经济调查》(1955年5月),湖南省档案馆,146-1-142。

④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目前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34-135页。

粮食的农户加以区别。必须纠正那种“家有余粮就是自发势力”或者把一切副业活动都说成是自发势力的错误说法。特别在购粮后引起大杀猪鸡鸭现象的地方,更应针对群众思想,集中地进行宣传,以便达到有效地安定其生产情绪的目的^①。1954年4月9日,中南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发展互助合作、提高农业生产的政治工作决议》,《决议》进一步指出,在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工作中有缺点、宣传有错误或者计划供应尚未进行的地方,必须认真地重新宣传粮食政策,必须将社会主义和落后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和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区别,将不法商人的投机活动和农民从事正常副业的区别,将高利贷的剥削行为和一般利息的借贷区别,进行正确的宣传^②。

1. 消除农民对统销的思想顾虑

如上文所述,各地的统销工作搞得草率粗糙,政策未深入宣传,对缺粮户摸底工作搞得不深入,再加上层层压缩指标,到乡到村时,分配的指标与群众需要数相差太远,因此引起群众的怀疑、误解与恐慌心理,造成人为的紧张。同时,在统购粮食任务已经结束尚未办理统销工作的地区,农民也存在着一些顾虑,如怕春天买不到粮食,怕粮食涨价,怕排队买粮等。如果不认真地办好统销工作,就不能迅速解除农民这些思想顾虑而安心地去发展生产力,而且也将会影响秋后的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执行。

基于统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各地在办理统销工作时,绝不能草率从事,必须进行艰苦的教育工作,着重说明国家经济建设对农民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以及农民支持国家建设的光荣责任;说明余粮是劳动所得,有余粮是光荣的,把余粮卖给国家更是光荣的,消除害怕当余粮户的思想顾虑,号召全体农民增加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国家工业化的事业。在充分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情况,心中有数地领导群众评议好缺粮户,认真地填发购粮证。对真正缺粮的农民,必须做到充分的供应,保证其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必须纠正草率从事、不进行教育及滥发购粮证的现象(如有些地方登记购粮的农户竟达到总户数的40%-50%)。另外,也要求各地纠正不认真办理评议工作,硬性地限制农民购粮,以致真正缺粮的农民无法解决口粮问题。对出于一时热情、带头过火、卖粮过多因而缺粮的干部与农民,经过评议,也给予同样供应^③。从而消除人心恐慌,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针对中南局的指示,湖南省要求:各级领导须在2、3月份对不同类型乡确实做些典型调查,求得领导心中有数。而后每个在乡工作干部还要通过生产对所在乡的粮食情况逐步进行深入了解。对于那些少数分给统销粮食数字的确不够的户和因为统购过多而必须实事求是予以补救的户,应该分别情况,在适当时间予以必要的调整;对于装穷叫苦的,要摸清底细,耐心加以教育说服;对个别故意叫嚣浮动人心的,应该及时予以揭发。同时要摸清各级机动粮的底,摸清各种地方公益粮之底,以及大体摸清各地粮食在过去习惯自由流动情况之底,到1954年春耕以前根据情况在专区之内的各县之间做一次小范围的适当调整^④。湖北省在统销政策上着重宣传:(1)缺粮多的多供应,缺粮少的少供应,不缺粮的不供应,现在缺现在供应,将来缺将来供应。(2)来人来客、红白喜事、灾荒意外,根据实际需要保证足量供应。(3)农村副业必需粮食,根据需要及节约主粮原则大力供应。(4)产啥粮吃啥粮,有啥粮供应啥粮。(5)农民在统购后的剩余粮食,欢迎卖给国营粮店和合作社,并允许农民自己存储,自由交换,但

①《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指示》(1954年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37页。

②《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发展互助合作、提高农业生产的政治工作决议》(1954年4月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45-46页。

③《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做好粮食统购统销结束工作大力开展农业生产运动的指示》(1954年元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42页。

④《春耕生产是当前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1954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92页。

不许卖给私商^①。从实施效果来看,凡是干部掌握了粮食政策,并向群众进行了通俗具体宣传的,一般能够达到稳定人心,有利于统购统销与发展生产。

2. 针对不同阶层的农民采取相异的措施

从湖北典型乡调查材料来看,1953年贫农(包括新中农)售粮占总购粮数的50%~60%,中农(老中农)占30%~40%,富农占10%左右^②。另从河南省1953年统购结果来看,富农出售的粮食所占购粮总数的比例很小(据34个县168个乡的统计:其中9个乡的富农没有余粮可售,其余159个乡富农售出的粮食只占购粮总数的5.56%),而统购粮食的主要对象是中农和富裕中农^③。再如广东省1953年各阶层售粮占已购粮数,贫农(包括新中农)占50%~70%,一般在60%左右;中农占20%~40%,一般在30%左右;富农占10%左右^④。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后,贫农一般是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的,而对于在统购统销工作中摇摆不定的中农和产生抵抗行为的富农,则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中农由于持有较多粮食,是粮食统购的主要对象,而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对出售余粮有较大的抵触,对社会主义新道路,有犹豫和动摇,这样就使得干部易于滋长歧视和强迫中农的错误思想。针对有些地方对中农态度不够慎重,夸大了中农的动摇性一面,对于他们不进行艰苦教育工作,轻率地采取单纯“挤”的错误方法。中南局提出,要根据总路线及粮食政策向他们反复说明利害,指明前途,尽力打通他们思想。使他们明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虽对于他们待价而沽有矛盾,但稳定物价的利益,比他们囤积一点粮食的利益要大得多,国家掌握粮食之后市场稳定也将无高价可待。同时,要向他们讲清楚剥削发家的道路走不通,因为他们斗不过奸商与富农,最后吃亏的还是他们^⑤。在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要坚持团结中农,反复交待政策,陈明利害。

而对于富农,针对一些地区对富农打击有些过重,斗争范围牵涉较宽,斗争方式不大适当(用土改中斗争地主办法,虽然当时也指出了斗争的方法是说理算账,斗争的目的是要他卖出余粮)的做法。中南区要求,不能一般地采取硬性斗争办法,首先,应该发动起广大贫农中农,使富农感到孤立,他们叫喊没有了市场,以此创造争取他们守法的条件。其次,发动农民,摸清他们的余粮底子,就使他们不易抵赖。再次,对于他们也进行教育,指明出路,说明利害。为了使多数富农把剩余粮食卖给国家,也不宜采取其他硬性斗争形式和过重严格的处分办法^⑥。这样做的好处,既可以到达政治上孤立于经济上限制富农的目的,又不致由于打击过重引起中农的恐慌。

(二)进一步完善统购统销运行办法

针对统购统销政策实施过程中畸重畸轻的情况,中南区不断完善统购统销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办法。对于统购,逐渐形成了以下方法:1.自上而下分配统购数字,反复摸底调整任务。2.大规模的训练干

①《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总结报告》(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76页。

②《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总结报告》(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77页。

③《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粮食统购工作的总结报告》(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68页。

④《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广东省购粮工作初步总结报告》(1954年元月28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89页。

⑤《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目前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36页。

⑥《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目前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37页。

部、积极分子,召开代表会议,打通思想,发动认售,然后分片摸底,初步确定余粮户及认售数字。3.通过干部、积极分子和代表,分片酝酿,发动自报,结合小组评议。4.有余粮的党员干部带头,层层发动,分批认售,形成爱国售粮高潮。5.乡统购委员会进行评议审查。6.分批陆续入仓,以收购点收粮为主,辅以在乡接收,然后转运入库的办法。7.召开爱国售粮大会,表扬增产售粮模范,影响与提高落后,组织物资交流与储蓄。8.完成购粮任务后,当即宣布统购结束,转入生产,做好统销。如江西省农村,1954年统购工作,采取做法一般是开好各种组织会议,训练干部,成立粮食统购统销评议委员会;将田亩划片评等,找标准,一般算,两头评,确定各户产量;划清余、够、缺界限,将任务布置到户^①。

做好统销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摸清有多少人缺粮,缺多少粮,缺多多供应,缺少少供应,使农民全面解除对粮食供应的紧张心理,才能确实控制市场稳定粮价,并有利于今后粮食统购,刺激农民增产粮食。对于统销方法,经过调整,一般是采取:1.教育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全面交代政策,大体摸清缺粮情况。2.召开代表会议,反复宣传政策,选举乡评议委员会。3.通过干部、积极分子和代表分片宣传、酝酿、总结小组评议。4.乡评议委员会进行评议审查之后,召开缺粮户会议复评,然后由乡政府批准,填发购粮证。这项工作也是一个群众运动,不能轻率,同样要耐心发动群众,依靠购粮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切实评好缺粮户,发给购粮证,以解除统购后缺粮农民的顾虑。在评议过程中,对于售粮后还有余粮的农民,要说明只要不进行市场投机,仍可向合作社、国营粮食公司自由出卖,并允许农民之间互通有无。对于出于一时热情卖出了口粮的部分农民和部分积极分子,要查明情况,给予妥善解决,对于一般粮食足用的农民要说服他们不要争领购粮证,如遇有特殊困难,可以另行解决。总之,要通过评议工作,摸清底子,避免供应中供应量过大和压缩过紧的偏向。

上述做法较为细致,比1953年购销工作大有改进,在确定各户具体任务时也有比较可靠的依据。当然,亦有个别地区发生“政策服从任务”以任务套产量的现象。

(三)建立国家控制的农村初级粮食市场

粮食统购统销基本结束后,农村经济呈现了死滞状态。活跃初级市场,组织农村余粮、缺粮和粮食品种间的相互调剂,扭转粮食统购后初级市场呆滞、副业停顿、城乡关系紧张的状态,是当时国民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建立国家领导的粮食市场,使农民可以进行盈余调剂,满足生产生活所需。

如河南许昌,1954年4月5日,许昌地委工作组到扶沟县崔桥区的两个集市(崔桥、李桥)试办国家粮食市场,经过对群众大力宣传政策,3天后组织了市场交易,并初步取得了成绩:(1)粮食上市量日趋增多。如李桥市场第一集上市量691斤,除满足群众调剂外,国家收购了463斤。第二集上市量达1422斤,比上集上升105%,售粮户75人增加了76%,除群众交易外,国家收购997斤,增加了115%。崔桥市场第一集上市量1127斤,群众买去348斤后,国家收购779斤,现在的上市量已增加到2000余斤。这样既满足了群众要求,又充实了国家力量,群众说:“这就好了”,都表示非常拥护。(2)由于粮食上市量逐渐增多,粮食供应量也随之下降。4月上旬该区日销量为12000斤,中旬则降为8500斤,同时粮食每日收购量占日销量40%弱,副食品上市也随之增多,且价格下降,如红薯干原来卖0.07元—0.08元1斤,并卖不完。(3)由于粮食市场变化的影响,棉花上市量也骤然增加,全区4月上旬收购3000余斤,4月中旬收购即达5000余斤,增加了70%。15日以后上市量更大,20日一天即收购1000余斤,卖棉花群众由原来50人左右,增加到160人左右。在价格与手续费上,采取买粮人与卖粮人均有利的原则,规定出售价格稍高于收购牌价1.5%左右,收手续费2%—2.5%,购粮价格低于统销牌价,特别缺的粮种,可高牌价10%,但国家牌价不动。准许粉坊、豆腐坊,及统购后的油坊,在市场上按生产实际需求买原料

^①《江西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194页。

(发购买证明),其用成品换原料时,所换来的其他粮食,准许卖给国家^①。

另如河南濬县城关镇国家粮食市场建立后,逐渐克服了购粮群众的思想顾虑,粮食市场成交量一天天增加。1954年3月31日成交了4宗85斤;4月1日至3日成交9宗,粮食168斤;4日至6日成交40宗,成交量1135斤;7日至9日就增加到44宗,成交量1651斤;10日至12日,中间因刮大风也成交了62宗,1132斤;13日至15日,更增加到66宗2867斤。到15日止,共成交225宗,成交量达7040斤。从上市粮种来看,由5种增加到12种。在一般情况下,稀见的黄米、粟米、青豆、红豆等粮种也逐渐上了市。由于直接交换互通有无的开展,也相应地减少了国家粮食的供应,以3月下旬供应量为100,则4月上旬的供应量只占3月下旬的69%。马料的供应也大大的减少了,上月29日至4月3日,还供应马料122户,杂粮9012斤。4日至9日就降到37户1858斤,10日至15日6天内降到只供应16户835斤^②。

由于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城乡经济开始活跃,对转换统购统销后的紧张空气,对减轻国家粮食供应方面的负担和组织农民进行有无调剂,对推动春耕生产运动均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河南濬县一区高村营农民徐德林原来有粮不敢整卖,不断的2升、3升零卖,经贯彻统销后的余粮可以卖给国家,到国家粮食市场自由交易和互相调剂,在农村允许小量的交换政策后,说:“早知道这样好了,明天多弄点来卖!”一区李庄农民李文恒1954年4月5日在国家粮食市场上卖了小麦84斤,由于干部宣传了政策,到4月8日、9日两天推着小车又在国家粮食市场上出售小麦324斤、大麦129斤。北关农民赵鸿合、王合善、赵振礼3户卖出余粮后,一致喊:“透了底,要求供应”,但当知道国家建立了粮食市场后,也不要求购粮了。

由于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国家市场和农村之间互通有无交换的开展,在粮食品种上进一步满足了群众要求,弥补了国家调剂的不足,便利了群众。如一区大高村农民王合家有青豆不能做饭,想换米吃,4月6日听了粮食政策后,4月8日在粮食市场上换回了小米。屯里村农民李永安有绿豆19斤,想要换黑豆,双庙农民李金山有20斤黑豆想换绿豆,2人在国家粮食市场上进行了互换,双方满意。一些缺牲口料的,也在国家粮食市场上互换、交易得到了解决。

由于粮食政策的宣传贯彻,群众在粮食问题上的紧张心理有所克服,余粮户和缺粮户及品种间的互换调剂有开展,因而也提高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如陈庄农民陈文义在国家粮食市场上卖了42斤高粱之后,就买成大粪准备上地。陈村农民何德林卖了65斤的麦子做本,到煤窑拉煤搞副业。尤其在紧张的下种季节,通过互换,解决了不少种子问题。如农民苏士俊、宋建云种高粱,到哪里也找不到种子,后在国家粮食市场上找到了高粱种子,解决了问题。东西王桥的豆腐坊和城内卖豆芽的,原先原料缺乏,影响了副业生产,也解决了原料问题^③。

总之,建立国家管理的没有粮商参加的粮食市场,不仅便利了农民进行互通有无和粮种交换,从而减轻了国家供应压力,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农民在统购后的思想顾虑,促进了农业生产,还可以使国家增加粮源,为今后粮食统购创造有利条件,农村经济的死滞状态亦有所好转。但粮食市场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市场管理不严,投机套购黑市现象仍未彻底消灭,成交量过少等。

①《中共中央中南局批转河南扶沟县崔桥区建立国家粮食市场的经验》(1954年5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49-150页。

②《中共中央中南局批转河南濬县城关镇建立国家粮食市场的初步经验》(1954年5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55页。

③《中共中央中南局批转河南濬县城关镇建立国家粮食市场的初步经验》(1954年5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155-156页。

三、结语

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为了有把握地控制市场,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以便保障国家工业化建设,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初,由于自由市场的存在,农民原本可以获得更高收益的余粮,被国家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收购,作为理性的农民,必然会对粮食统购进行或明或暗的抵抗。同时,运动之初,对农民来讲是信息不对称的,由于统销过程中的偏向,他们不明确余粮被国家收购之后,其生产生活所需粮食能否真正得到满足,固然会对粮食统购统销产生怀疑。从1953-1954年中南区粮食统购统销实施情况来看,针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向,人民政府的工作做法是不断改进的,从宣传教育入手,同时着手建立粮食市场解决农民粮食调剂有无,以此来消除农民的顾虑,达到稳定其生产情绪与安定地方秩序的目的。

1955年,国家出台了粮食“三定”政策,农民情绪才逐渐得以稳定,农村紧张形势渐趋缓和,同时也使农村统购统销制度得以定型。建立在个体农民生产基础上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而高级社“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才在社员中进行分配”的分配制度,很好契合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运行所需的制度环境,因此,该项政策实施后也加快了农业合作化步伐。在集体化时期,由于“集体生产,统一分配”的经营方式,再加上违背经济规律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与此并行,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致使农民长期缺乏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亦长期在低水平基础上徘徊。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在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参 考 文 献]

- [1] 王丹莉. 统购统销研究述评[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8, (1).
- [2] 田锡全. 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1953—1957[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 [3] 郑风田. 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M].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0.



(上接第 65 页)

[参 考 文 献]

- [1] 卢厚杰. 唐代财经若干问题与政府应对研究[D]. 山东大学, 2016.
- [2] 阎守诚. 危机与应对: 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3] 蔡庆林. 唐代逃户的时空特征[D].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 [4] 张国刚.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5] 黄进华. 宇文融括户与唐朝中央财政体制的演进[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
- [6] 刘玉峰. 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规划形成及其经济形态特征[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8, (3).